

文学研究与争鸣

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 及其文体品格^{*}

章罗生

【提要】史传报告文学继1990年代向纵深发展,出现其创作高峰后,新世纪以来又有更新、更大的发展,表现出更加繁荣昌盛、迅猛发达之势。其表现,一是长篇作品(包括长篇系列)更多、篇幅更长、分量更重;二是不仅对原有题材有补充和深化,而且还发掘了更多新题材领域;三是更多作家转入或侧重于“史传”创作且取得显著成就;四是主体态度更客观、冷静,形式方法更多元、多样。它除具有报告文学的“新五性”等一般特性外,还具有现实观照、文化批判与悲壮沉郁、史诗风范等独特品质和功能。

【关键词】史传报告文学 现实观照 文化批判 悲壮沉郁 史诗风范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0)01-0116-10

“史传报告文学”是笔者在原“史志性报告文学”基础上,针对其原概念的不够科学、准确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笔者认为,它不仅代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观念革新,而且代表了其文体的真正独立与深化,甚至代表了其发展前景和方向。^①因为,它不仅长篇和长篇系列最多,分量最重、内容最丰富、形式最多样,而且它方兴未艾、来势迅猛,大有雄霸文坛、一统天下之势。正是如此,有人提出了21世纪“将全面进入纪实文学时代”的论断。^②然而,与此相比,人们对史传报告文学这一“新生事物”的现状及其重要意义却认识模糊。有感于此,本文试就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及其文体品格作一论述,以其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现状

纵观至今为止的创作可知,史传报告文学

与科技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等不同,它的发展不是呈波浪式、曲线型,而是呈直线上升、稳步发展的态势。可以说,它在题材、体裁和思想、形式等方面,是逐步递进、不断深入拓展的。它从新时期初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和《命运》等开其端,至1980年代中后期,以钱钢、胡平、张胜友、大鹰、董汉河和徐志耕等人为代表形成流派。可以说,该流派是与问题报告文学同时诞生、共同发展的,或者说就是从问题报告文学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它必然带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及其理论意义》(06BZW054)的前期成果。

① 章罗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变革》,《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 余音:《纪实文学革命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有问题报告文学的诸多特点，如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揭批林彪、“四人帮”与极左政治，以强烈的反思精神干预现实、批判历史，等等。不同的是，它的取材更重历史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史，着重挖掘和表现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揭示历史的真相，并以当代意识进行审视、观照或重新评价；在手法上，虽也表现出宏观综合和学术性、资料性等特色，但不如问题报告文学那样普遍和突出；在艺术风格上，它没有某些问题报告文学的偏激、尖锐，但比问题报告文学更为深沉、凝重。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中国的眸子》，大鹰的《志愿军战俘记事》，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以及“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系列等。总之，至19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的深入，史传报告文学创作已初步展开了对中国革命、国共两党、抗日战争，尤其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及历史的全面反思。

相对于1980年代而言，1990年代的创作向纵深全面发展，出现了史传报告文学与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史上的新高峰。其表现，一是以邓贤、权延赤、叶永烈、王苏红和戴煌等为代表，形成所谓“纪实文学”创作热；二是以胡平、麦天枢、张建伟、冷梦、程童一等为代表，形成新的历史题材创作热；三是长篇系列的大量涌现，如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张建伟的“晚清”系列、国防科工委组编的“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编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系列等。

这一时期的创作，其题材继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如在反思中国当代史方面，除集中反思1957年的反右运动外，还披露和反映了有关知青运动、三门峡水库移民、1958年炮击金门、朝鲜战争以及“两弹一星”等国防高科技发展等。这方面的作品有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白描的《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陈道阔的《中国石油大会战》，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胡平的《三个人和一个小数》、《美丽与悲怆——蒲熙修与她的年代》、《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冷梦的《黄河大移民》，沈卫平的《8·23炮击金门》，以及徐剑的《大国长剑》与《鸟瞰地球》，等等。在反思中国现代史方面，尤其是集中反映和反思了抗日战争（包括国共抗战）以及日本民族等。这方面的作品，除“抗日战争纪实丛书”（包括徐志耕的《浴血淞沪》、金辉的《恸问苍冥》和郭晓晔的《东京大审判》等23部）外，还有邓贤的《大国之魂》、《流浪金三角》，张洪涛、张朴宽的《燃烧的太阳——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杨大镇的《中国远征军印支征战纪实》以及李鸣生、岳南的《寻找“北京人”》等。不仅如此，有的作品还上溯至清末，将近代与当代史相对照，从更深广的背景中寻找对现实有益的经验教训。如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钱钢的《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年祭》，程童一等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冷梦的《沧海横流》，以及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等“晚清”系列。

新世纪以来的史传报告文学又有更新、更大的发展，可以说，它将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高潮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表现出更加繁荣昌盛、迅猛发达之势。其表现，一是长篇作品（包括长篇系列）更多、篇幅更长、分量更重。如长篇系列有黄传会、舟欲行的“中国海军三部曲”，梁东元的“尖端科学大纪实”系列（4部），陈敦德的“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9部），岳南的“考古中国”系列（10部），还有侯树栋、范震江主编的“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刘丕林的“国共对话”系列，以及中国文联出版社的“风云岁月纪实系列”、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文化名人”系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毛泽东与高层政治交往”书系、中国档案出版社的“毛泽东与×××”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的“一~四野征战纪实”丛书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书系等。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出了修订本或第2版，如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边震遐的《朝鲜战争中的英美战

俘纪事》、郭晓晔的《日本幽灵》、李鸣生的《全球寻找“北京人”》和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等。

二是不仅对原有题材又有补充和深化,而且还发掘了更多新题材领域。如在中国现当代史(包括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或国共抗战等)方面,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补充与深化的(主要是长篇),有胡兆才的《血战: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白云的《血线——滇缅公路纪实》,莫夫的《喋血军魂张自忠》,李伶的《西安事变的序曲》,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与《黄河殇》,王霞的《磨难——西路军女红军团长的传奇》,权延赤的《周惠与庐山会议》与《杨成武见证文革》,以及梁东元的《596秘史》等;尤其是有关红军长征的长篇,原只有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近年来则有王树增的《长征》、李镜的《红色远征》和李升泉、李茂林的《马背上的共和国》等。当然,在这方面,更多的是新题材领域的开拓或新的史料的挖掘。如钱钢、胡劲草的《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披露了清末民初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的内幕及留学生们的人生命运;刘小童的《驼峰航线》反映在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美开辟中印空中“死亡航线”,与日寇进行艰苦、悲壮的殊死战斗;郭晓晔的《英雄万岁:东北老航校暨人民空军创建史诗》以我军的第一所航校——东北老航校的创办为线索,全景披露了人民空军惊天地泣鬼神的开天之路;张聿温的《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国民党内“三大秘案”之一的“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首次全方位地披露了1950年代初,为开发建设新疆、解决屯垦戍边者的婚姻问题而进疆的八千湖南女兵的多舛命运。尤其是纪晓松的《天路行军——1951千名女兵徒步进藏纪实》,首次披露了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一段历史——1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兵分散在进藏队伍中,经过一年甚至四年(边走边修川藏公路)艰苦卓绝的行军,以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世界屋脊。

而丁三的《蓝衣社碎片》则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反思了“蓝衣社”这一著名的国民党反动组织,认为它成立于历史危难之际,源于救国兴亡,也曾起过进步作用,对其应重新认识。类似作品还有马畏安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张聿温的《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钟兆云的《国之大殇:台湾御侮报告》和熊诚的《邓小平在江西的非常岁月》等。而在反思抗日战争或中日关系等方面,有班忠义的《血泪“盖山西”:日军山西性暴力十年调查》,旻子的《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和张力的《百万日侨大遣返》等。当然,新时期至今已有30年,改革开放的“现实”也已变成历史,因而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也出现了一批这方面的作品。它们或全景式再现整个历史过程,如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纪事》;或重点回顾某些年代与事件,如何建明的《台州农民革命风暴》与《破天荒》,张万舒的《大包干内幕》,涂俏的《改革现场:袁庚的1978~1984》,以及肖舟的《胡福明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等。

三是更多作家转入或侧重于“史传”创作且取得显著成就。如原以写现实题材为主的赵瑜、黄传会、蒋巍和郝在今等,新世纪以来都奉献出了“史传”精品力作:赵瑜继《革命百里洲》(与胡世全合作)后,又潜心写了长达70万字的《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征求意见稿);原以长篇《八千万流民部落》等行世的郝在今,继获奖长篇《协商建国——1948~1949 中国党派政治日志》后,又潜心写出了影响广泛的长篇《中国秘密战》;原以关注现实、写改革题材等为主的蒋巍,也写了《红花·血花……——延安时代的女人们》(与雪扬合作)等;以《中国农民调查》等享誉文坛的陈桂棣、春桃,也写了长篇《包公遗骨记》;而以“反贫困作家”著称的黄传会,则以“十年磨一剑”的执著,贡献了长达百万字的长篇系列“中国海军三部曲”(与舟欲行合作)。此外,原以现实与历史题材并重的胡平,新世纪以来又集中推出了《战争状态》与

《100个理由》等长篇“史传”力作。这样，再加上众多的新老作家如黄济人、董汉河、叶永烈、权延赤、李辉、邓贤、徐志耕、冷梦、郭晓晔、陈敦德、梁东元和李伶、卢一萍等，史传报告文学的作家队伍就显得尤为整齐、壮观，充满生机与活力。

四是主体态度更客观、冷静，形式、方法更多元、多样。这一点，可以说，它既与整个报告文学创作发展相一致，但又比其他品类更鲜明、突出。就主体态度的客观与理性精神的深入而言，它是与思想解放的深入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同步的，或者说，是不断克服“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缺陷与不断强化民主、文明意识的结果。如对国共关系的认识与对国民党抗战问题的评价，就既伴随着对实事求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深化，也伴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与推进。因此，在1980年代，史传报告文学中还基本上只有黄济人的“战俘”系列涉及此问题。至1990年代，“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等正面反映国民党抗战的作品就有不少。而自新世纪以来，这方面不仅又有“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和《血战：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等更多作品，而且如《蓝衣社碎片》、《黄河口决堤》、《驼峰航线》、《西安事变的序曲》和《中山舰事件》等，能重新评价“蓝衣社”等特务组织、黄河口决堤与中山舰事件等重大而敏感的历史事件，同时也能进一步挖掘和理性表现有关中美共同御侮、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尤其是在反思中共历史与批判中国当代史方面，新世纪创作不再只集中在反思“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右”和“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和批判极左政治上，而进一步挖掘和再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与重大事件，如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延安肃反”、“高饶事件”、女兵进藏、湘女援疆以及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农业学大寨”、“邓小平复出”和“大包干”等内幕。

与此相联系，就方法、形式而言，史传报告文学也可以说是整个报告文学中最丰富、复杂，最有代表性的。首先，它不仅已形成了事

件型、人物型、思辨型、综合型，而且也形成了再现型、表现型和考证型等较成熟的品类。如《蓝衣社碎片》、《黄河口决堤》、《驼峰航线》、《西安事变的序曲》、《中山舰事件》和《长征》等基本上是事件型，即以事带人；《毛泽东与蒋介石》、《天路行军》、《八千湘女上天山》、《磨难》、《哑巴红军传奇》、《邓小平在江西的非常岁月》、《红花·血花……》和《喋血将军张自忠》等是人物型，即以人带事；《战争状态》、《100个理由》、《革命百里洲》、《唐山警世录》和《高西沟调查》等是思辨型，即在对历史的批判中贯穿着浓重的哲理思辨；《梦之坝》、《风雨长征号》、《唐山警世录》、《国运》、《尊严》则可以说是综合型，即人、事、理三者兼备，融为一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借用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术语，史传报告文学也可分为再现、表现等类型——正如李镜在谈到他的《红色远征》的创作时所说：“我把自己要写的长征与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做了这样的界定：索尔兹伯里是在漫谈、解读、评说长征，我则想全景式的再现长征。”^①因此，《红色远征》、《马背上的共和国》、《血战》、《中山舰事件》、《感天撼地50军》与《文化大革命纪实》等，基本上是再现型，即借鉴小说笔法等客观再现其过程与场景而基本上不作主观评述，亦即运用的是所谓“全知视角”；而《远东朝鲜战争》、《长征》、《协商建国》、《天路行军》、《血泪“盖山西”》和《蓝衣社碎片》等，如索尔兹伯里一样，对描写对象进行“漫谈、解读、评说”，可以说基本上是表现型，即它们既尊重客观史料又贯穿着作家的主观评说，采用的是所谓“限制视角”。当然，在这两者之间，还可细分出两类：一是介于表现与再现之间、“全知视角”与“限制视角”相结合。如《死亡联盟》、《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尊严》、《飞天大传》、《国之大殇》和《国运》等，它们既较严格地依据史料与尊重客观事实，但又不完全受其拘束，在细节与言行描写方面有一定“自由”。二是与一般表现型不同，一些作品不仅

^① 李镜：《红色远征》封面勒口，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在大的历史事实与背景方面完全依据史实，而且在细节与言行描写方面也“无一字无来历”，完全尊重采访与档案资料，同时还以注释形式说明其出处。这就类似于科学考证而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因而可称为“考证型”或“学术型”。如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和李伶的《西安事变的序曲》等即为典型代表。

其次，在体制、结构与叙述手法方面，它们也丰富多彩、各有千秋。其中有的是宏观全景式，即以较多的人事和较长的历史，在深广的时空背景下，或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或反思历史的成败得失。如《长征》、《红色远征》、《马背上的共和国》、《感天撼地50军》与《远东朝鲜战争》等，再现了长征、苏维埃政权、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八路军抗战纪实》、《血战》、《驼峰航线》、《文化大革命纪实》、《胡福明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国运》等，反映了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悲壮大别山》、《英雄万岁》、《战争状态》、《革命百里洲》、《梦之坝》、《飞天大传》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等，围绕挺进大别山、人民空军创建、土地改革、三峡工程、“两弹一星”和“北京人”的丢失与寻找等，从某一特定角度，表现和反思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中国海军三部曲》则再现与评说了中国海军丰富复杂、悲壮雄奇的百年历史。有的围绕某一典型历史事件或人物，也从某一侧面“透视”或反思了历史。如《中山舰事件》围绕“中山舰事件”，《西安事变的序曲》围绕西安事变前的共产党与西北军的秘密联盟，《天路行军》围绕1951年千名女兵徒步进藏，《血泪“盖山西”》围绕侯冬娥等受害女性与日军在山西的性暴力，《尊严》围绕“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都从某一特定角度或侧面再现和评说了历史。此外，在形式上，有的采用“编年史”，如《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分别以1944年、1949年、1955年、1964年、1971年和1979年等各个不同年代的大事为中心，来反映新中国不平凡的外交历程；有的采用政治“日志”，如《协商建国》

分别以1948.5.1、1948.5.2～8.1和1949.1.1～2.3、1949.2.3～4.21等具体时间为各章的结构线索，生动描叙了1948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历史内幕。

当然，就整个史传报告文学乃至整个当代纪实文学创作而言，至今为止，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是叶永烈。这一点，首先是他为创作时间最长、数量最大者之一。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纪实文学创作，至1999年出版的《叶永烈文集》50卷中，纪实文学就占了27卷。而新世纪以来，他又出版了《陈云之路》、《追寻彭加木》和《邓小平改变中国》等长篇力作。^①而在他的这些纪实文学创作中，史传报告文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次，他的创作不仅题材重大、独特，而且内容广泛、全面：不仅开辟了其独具特色的“党史文学”，而且构成了其中国现当代的形象历史。如《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反映了中共建党与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毛泽东与蒋介石》通过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个国共两党的领袖，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中国现当代史——正如作者所说：“红色三部曲”分别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这三句话概括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②而《历史悲歌》、《离人泪》和《傅雷之死》等反思了“反右”运动与“文革”内乱，《邓小平改变中国》则再现了新时期前后的历史转折与巨变。再次，他的创作形式创新、手法多样：既有以叙事为主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也有以写人为主的《离人泪——沉重的一九五七》，还有“以人带事”、“以人述史”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和《邓小平改变中国》；既有《红色的起点》的“T字形结构”，即

① 叶永烈在2004年写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序》中谈到：“红色系列”、“黑色系列”、“名人系列”、“行走系列”、“目击系列”和“自传三部曲”与“重返人间三部曲”等长篇系列，是他“近年来创作的概貌”。

② 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序：关于“红色三部曲答编者问”，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既以写横剖面为主——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又写及纵剖面——中国‘一大’代表们的后来，这样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又有《毛泽东与蒋介石》所运用的“比较政治学”等手法。^①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创作，不但继承了问题报告文学所开辟的政治理性的传统，而且还确立了学术考证和以“两确”（立论正确、史料准确）、“两馆”（图书馆、档案馆）保证其“非虚构性”的科学理性与美学规范；同时，又以其题材本身的魅力与独创以及“可读性”、“趣味性”等，基本解决了报告文学的所谓“文学性”问题。^②

二、史传报告文学的品质与功能

纵观史传报告文学创作可知，它除具有报告文学的“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与文史兼容的复合性^③等一般特性外，还具有现实观照、文化批判与悲壮沉郁、史诗风范等独特品质和功能。

其一，现实观照。史传报告文学之所以发展迅猛、方兴未艾，正是因为现实的需要与可能。也就是说，现实的改革与发展急需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的指导又急需总结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即所谓观今宜鉴古。而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又是一段付出了惨痛代价、走了许多弯路、有不少宝贵经验需要总结、吸取的历史。这样，再加上现实环境的宽松与社会政治的开明为作家们提供了勇于探索与独立思考的可能，因而史传报告文学就因时而生、顺势而长。因此，史传报告文学的兴盛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它所凸现的历史反思、文化批判与服务社会、启示未来的价值指向，就更是其现实激发与鼓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的结果。这一点，又主要表现在选题的针对性与哲理思辨等方面。

为什么史传报告文学的题材对象大多是中国现当代史（最远到近代）呢？除了年代近、史料丰富之外，主要是因为它与现实联系紧

密。即我国至近代才被迫开始救亡与启蒙的现代性追求，因此，当我们对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进行探讨时，都不免要进行历史的整体反思，要到那个时代中去寻找根源。因此，史传报告文学的许多作品都写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年。如《昨天》写于《南京条约》签订150周年之际，《海葬》是“大清国北洋海军一百周年祭”，《历史沉思录》有感于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20周年纪念，《哑巴红军传奇》等写于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时，“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等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唐山警世录》等发表于唐山大地震30年之后，《国运》与《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等问世于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而反思中日关系、批判日本民族的作品之所以持续不断、屡见不鲜，也是因为日本当局的“遗忘”以及中日关系与国际政治之复杂、微妙。当然，更多的还是当今社会引发的对类似历史事实的追寻。如《中国知青梦》等源于作者对1991年“青春无悔”回顾展的质疑；《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梦之坝》和《黄河大移民》等有关三峡与移民题材的集中涌现，是源于建设三峡大坝的现实背景；而反思“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右”运动、“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的作品之所以持续不断且日益深化，也只有在思想解放不断深入、政治环境日益宽松之时才有可能。而反思“两弹一星”与表现航空航天等国防高科技作品的涌现，也是因为“科教兴国”的现实需要与国防高科技的飞速发展。

思辨性虽是报告文学的共性，但史传报告文学因其题材重大、内容厚实而显得更为集中、突出；同时，也因其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现实，或将现实问题放在深广的历史背景下进

① 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序：关于“红色三部曲答编者问”，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章罗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变革》，《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③ 参见章罗生《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行考察而显得更深刻、睿智。事实上，它的服务现实、以古鉴今的功利目的也主要是通过这一点来实现的——无论其怎样客观、冷静，它总掩饰不了或大段集中，或夹叙夹议，或借题发挥的主体介入。或者说，它正是通过大量的议论与思辨来评判历史的。因此，它与一般历史著作不同：不是纯客观叙述历史，而是借历史的酒杯，浇现实的块垒；不在于再现历史，而在于受其启发与引导。如纪晓松的《天路行军》^①写到——

我的脑子里旋转着这样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这段珍贵的历史鲜为人知？为什么那些突现民族精神内核的动人故事未被广泛传颂？为什么那些用流淌鲜血的双手在世界屋脊开凿出川藏公路，用不息的生命和无私的精神融洽民族关系的功臣们，面对纷乱的世界和名利的诱惑，却能如此的淡然处之？

显然，作家们的这些问题与思考说明，他们的写作决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即吸取历史教训，弘扬民族精神，服务现实人生。

除直接抒发对历史人事的感慨之外，史传报告文学还常常借古讽今，甚至直接对现实进行抨击。如胡平在对历史人事进行议论时，常常对今天的不合理现象顺带进行讽刺、批判：《千年沉重》把江西的历史与现实穿插起来，从文化沿袭中寻找当代落后的根源；《战争状态》在对社会痼疾与国民劣根性进行深入分析时，常不免对现实进行抨击；而在《100个理由》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频繁。总之，如《日本幽灵》所写：“回望昨天的眼睛，永远注视着现实和未来”。

其二，文化批判。历史与文化从来就处于胶着状态：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历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史传报告文学不仅烙上了文化的深刻印记，而且因立足现实而显现出鲜明的批判特色。在这方面，尤以对“文革”的批判为甚。“‘文革’对中国是场浩劫，在思

想文化上造成的破坏尤为深重。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是对‘文革’黑暗、专制的一种拨乱反正，是对酿成文化悲剧的原因的反思。它的诉求非常简单和基本：恢复和尊重常理与常识。”^②胡平的《历史沉思录》和《中国的眸子》是最早从文化方面对“文革”进行批判的代表作。在《历史沉思录》中，作者别开生面，从红卫兵的心理角度来反思这出历史悲剧：“虔诚、盲从，好比‘TNT’炸药，幼稚和狂热，好比超级雷管，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恶魔。只是在特定历史环境、思潮推动下，一跃而过早登上政治舞台的普通人”，从而使读者看到了我们民族精神中因盲从、迷信和缺乏理性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中国的眸子》也不是单纯揭发和诅咒“林彪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的深层结构，从当权者的骄横无知、群众的麻木不仁，到告密者的卑劣、刽子手的残忍、时代的疯狂和人性的丧失等，都作了发人深省的文化分析。而在胡平的《千年沉重》、《禅机》、《战争状态》与赵瑜的《革命百里洲》、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作中，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更达到了全面、系统的新境界。它们由“文革”而上溯至“反右”、“五四”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深刻反思了“小农意识”、“痞子文化”与“斗争哲学”等等。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作品在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时更多地置于西方文化的视野中，通过东西文化的对比，使民族文化的封闭与落后得以显现并受到批判。如《昨天》、《海葬》与张建伟的“晚清”系列等就正是如此。《昨天》的作者突破了以往从政治层面上把中英鸦片战争看作是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创作观念，站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真空地带”，“着力揭示的是这场战争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后

① 纪晓松：《天路行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徐友渔：《“后主义”与启蒙》，《天涯》1998年第6期。

果”。^①在作者看来，中国文化充满道德却固执守旧，西方文化积极进取却伪善、骄横。这两种不同文化在接触和碰撞时必然衍生出不同的价值观念与取向。在西方文化的逼迫下，中国传统的“固执”必将屈服于外敌的“骄横”，而大清王朝的瞬间溃败，不仅败于装备的落后，更败于在“和平”上躺了两百多年的精神萎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和北洋海军的失败，也是败于中国文化。除了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之外，中华民族文化还经受了自近代以来迅速崛起的日本文化的挑战。日本在上个世纪带给中国人的苦痛成为许多中国国民心理难以清除的伤痕，加之日本人在战后抹杀历史的态度和行为，使得我们的报告文学家们不得不向国人再次反思那段历史，并试图从日本文化的源头上寻找日本民族及其现实表现的成因。如《恸问苍冥》在“两个民族一个世纪”和“他们为什么杀人”这两章中，从历史、宗教、心理等多种角度对日本人作了文化剖析和灵魂拷问；《大国之魂》在描写中日战争时，也处处把两个国家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进行对照，从而显现出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其三，悲壮沉郁。“人类的历史是充满着悲剧的历史”（赫尔岑语），对于近代以来多灾多难，充满屈辱、战争和荒唐的中华民族来说，悲剧就更是其主要基调。如此，以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为主要题材的史传报告文学，其笼罩着悲剧气氛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朱光潜认为：“悲剧比别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感和个人感情，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②由此可见，作品呈现悲剧色彩的首要条件是内容的严肃性。史传报告文学在再现历史人事时，杜绝了影射历史、发掘奇闻逸事的趣味性，而对灾难和苦难进行全方位的描述与反思。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为蒙受不白之冤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西路军女战士唱出动人情怀的哀挽之歌”；^③《海葬》、《昨天》描写的是晚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耻辱痛败的历史；《南京大屠杀》充满残酷血腥的屠杀场面；《历史沉思录》、《中国的眸子》、《文坛悲歌》等把极

左政治的荒谬和人在灾难中的悲惨境遇如实展示；等等。但“严肃”更包括崇高，史传报告文学所描写的悲剧中亦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即中华民族不仅在抵御外敌时表现出同仇敌忾、誓死抗争的浩然正气，而且在历经内乱、维护祖国的团结统一方面也表现出坚韧不屈。因而它所呈现的整体风格不是悲伤或雄浑，而是悲壮沉郁，即悲而不伤、沉重而不消沉。如《志愿军战俘记事》与《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的战俘和女战士们所体现出的在敌人面前的不屈气节；《南京大屠杀》与《唐山大地震》中除有血腥场面外，还有军民浴血奋战、团结抗震救灾等。尤其是在《驼峰航线》、《天路行军》和《八千湘女上天山》等作品中，这种“悲壮”更为突出。

当然，史传报告文学的所谓悲壮沉郁，也表现为人物与命运、环境的抗争。其常见叙事模式是，人物并未因恶劣环境或坎坷命运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是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最终才获得成功或被世人所肯定其价值。虽然结果也许是正剧，但过程却异常苦涩：常被打击与放逐，其窘迫的生存状态与辉煌成就呈现巨大的反差。这种情况在知识分子题材中表现尤为突出。如《敦煌之恋》中的段文杰苦恋敦煌，是国际公认的敦煌学开拓者，可他的成就却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完成的。《走出地球村》也说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是在中国最动乱、最不可思议的年代完成的，其中充满了令人痛心的艰辛、遗憾和悲剧。在“文革”中，科学家和科技人员不得不“靠边站”，许多人成为被任意打击和迫害的对象，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不只是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历史人物也没有等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他们——如《昨天》中的林则徐、《海

① 李昕：《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③ 黄国柱：《读〈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文学报》1988年3月13日。

葬》与《中国海军三部曲》中的李鸿章、邓世昌——在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个体力量的失败变得不可避免，甚至还要背负历史的罪责和骂名。

其四，史诗风范。“史诗”的原始意义是指“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①或“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②该意义经引申、演变后，人们则习惯于把那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结构壮阔的作品称为“史诗”。史传报告文学正是这样，它以较长篇幅和凝重笔触所叙写的，不是无关痛痒的野史秘闻，而是对现实有重要影响或哲理启示的严肃“正史”，包括从晚清的改革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反右”、“文革”到“新时期”，从共产党到各民主党派，从科技到文教，等等。因此，题材的重大、主题的严肃、内容的丰富以及人物的典型、哲理的探寻与结构的宏阔等，就从整体上构成史传报告文学不同一般的“史诗”风范与特色。

史传报告文学通常都有较长篇幅，且有越写越长的趋势。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这类创作几乎都是中长篇，甚至动辄为长篇系列。对此现象，虽然有人忧虑并呼吁“长风不可长”，但更有人认为，史传报告文学“用较长的篇幅表现社会人生内容也是报告文学对现实环境的适应，不仅仅是作家的主观行为”。^③事实的确如此：虽然这些长篇中也不乏“掺水”、“铺陈”之作，同时也缺乏明确的文体意识，但总的来说，还是现实需要，是存在决定意识。即我们的历史——尤其是现当代史，内含太丰富、复杂、沉重，我们对它们的反思与批判太肤浅、缺失；而我们的“现实”又太需要历史的“烛照”与理性的“建设”！因此，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作家们需要运用大量资料，还原历史过程，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样，就导致作品追求其真实、系统与完整，也就从整体上体现出“史诗”特色。那些冠以“中国革命”、“抗日战争”、“国防科技”、“中国海军”之名的丛书，和以“中国院士”、“文化大革命纪实”、

“历史沉思录”、“中国秘密战”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纪实”等命名的“大而全”的单篇是如此；那些描写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如“胡风反革命集团”、“庐山会议”、“反右”运动和“高饶事件”等的作品也是这样：往往以该事件为中心而追溯其前因后果；甚至以一两个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如《毛泽东与蒋介石》、《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和《磨难》等也不例外：都通过其人物反映了历史的某一侧面。至于像《开埠——南京路150年》、《革命百里洲》、《战争状态》和《国之大殇》等全面综合或宏观表现的作品就更是如此。

关于“史诗”之“诗”，我认为，在广义上，可理解为包括所有文学手法与审美形式的运用。如有关“中国革命”、“抗日战争”、“国防科技”、“外交年轮”的丛书和《中国海军三部曲》等，以及叶永烈、邓贤、徐志耕、张正隆、胡平、赵瑜、冷梦与郝在今等人的创作，它们所描写的故事的曲折、情景的生动、人物的鲜明、议论的深刻与手法的多样等，都在广义上构成“诗”的氛围。当然，在狭义上，顾名思义，“诗”主要还是指哲理诗情，包括题材、人物、故事中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哲理意蕴和所表现的崇高精神——尤其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一点，虽说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也有表现，但由于史传报告文学题材内容的厚重、特殊——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救亡图存和内忧外患，因而其表现更为鲜明、突出。如清末民初洋务派、改良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改革，国共两党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其内战与和谈，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土改肃反、阶级斗争、“文革”浩劫与拨乱反正，等等，无不充满忧伤、沉重与悲壮，期间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感天动

① [法] 伏尔泰：《论史诗》，伍蠡甫主编《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② [德]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8页。

③ 李炳银：《报告文学论》，《新华文摘》2006年第8期。

地的民族英雄与爱国志士，又凝聚、蕴含了多少令人扼腕长叹的血泪教训与历史遗憾！这一点，我们从《海葬》、《昨天》与《温故戊戌年》，到《南京大屠杀》、《恻问苍冥》与《东方大审判》，从有关“中国革命”、“抗日战争”、“国防科技”等大型丛书等，到《大国之魂》、《驼峰航线》、《8·23 炮击金门》、《远东朝鲜战争》与《长征》，从《中国秘密战》、《协商建国》、《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与《文化大革命纪实》，到《邓小平改变中国》、《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台州农民革命风暴》与《国运》等，均可深刻感受到。当然，这种“史诗”风范还包括所谓以“当代意识”烛照历史的文化启蒙与现实批判精神等。它们或总结经验以启示现实，或揭示内幕以恢复真相，或臧否人物以针砭时弊，或反思历史以弘扬精神，等等。因此，“史诗风范”实际也与前面所谈的“现实批判”、“文化启蒙”、“悲壮沉郁”与等紧密相联，它们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史传报告文学是新时期以来涌现出的重要文学现象与流派之一。它经过 1980 年代的奠基、1990 年代的发展，至新世纪更得以全面、深入拓展。它在文体品质、功能与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现实观照、文化批判、悲壮沉郁与史诗风范等特色，同时也向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然而，史传报告文学内涵丰富、现象复杂，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本文仅只从其发展、现状的梳理与文体品质、功能的概括等方面，对其作一初步探讨。其他更全面、深入的论述还有待包括笔者在内的更多学者的继续努力。

本文作者：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The Development and Stylistic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Reportage

Zhang Luoshe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reportage in the 1990's, the creative peak appears. There are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historical reportage since the new century, in which historical reportage shows more prosperous and rapidly developing trends, as embodies in three aspects as follows: Firstly, historical reportage contains more full-length works (including long series), longer length and greater emphasis on contents. Secondly, it not only complements and deepens the original subject matter, but also explores more new areas of subjects. Thirdly, more writers transfer their attention to or focused on the "historical" creation and mak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Fourthly, the main body of literature is more objective and rational and the forms and methods become more various. Historical reportage has a unique quality and function such as view of reality, cultural criticism, tragic-solemn and gloomy, epic style and so on, in addition to its general features like "new fiv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istorical reportage; view of reality; cultural criticism; tragic-solemn and gloomy; epic style